



唐诗学书系之五

唐诗学文献集粹

下

陈伯海

主编

查清华

胡光波

文师华

刘晓平

傅蓉蓉

许连军

编撰

书系主编 陈伯海

副主编 朱易安

查清华



唐诗学书系之五

唐诗学文献集粹

下

陈伯海 主编

查清华 胡光波

文师华

刘晓平

傅蓉蓉

许连军

编撰

书系主编

陈伯海

副主编

朱易安
查清华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明代部分

唐诗学文献集粹

答章秀才论诗书

[明] 宋 濂

濂白：秀才足下，承书，知学诗弗倦，且疑历代诗人皆不相师，旁引曲证，亹亹数百言，自以为确乎弗拔之论。濂窃以谓世之善论诗者，其有出于足下乎？敢然，不敢从也。濂非能诗者，自汉魏以至于今，诸家之什，不可谓不攻习也。荐绅先生之前，亦不可谓不磨切也。揆于足下之论，容或有未尽者，请以所闻质之，可乎？

《三百篇》勿论已，姑以汉言之，苏子卿、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？观二子之所著，纡曲凄惋，实宗国风与楚人之辞。二子既没，继者绝少。下逮建安、黄初，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，刘公干、王仲宣力从而辅翼之，正始之间，嵇、阮又叠作，诗道于是乎大盛，然皆师少卿而驰骋于风雅者也。自时厥后，正音衰微，至太康复中兴。陆士衡兄弟则仿子建，潘安仁、张茂先、张景阳则学仲宣，左太冲、张季鹰则法公干，独陶元亮天分之高，其先虽出于太冲、景阳，究其所自得，直超建安而上之，高情远韵，殆犹大羹克飴，不假盐醯，而至味自存者也。元嘉以还，三谢、颜、鲍为之首。三谢亦本子建而杂参于郭景纯，延之则祖士衡，明远则效景阳，而气骨渊然，駸駸有西汉风。余或伤于刻镂而乏雄浑之气，较之太康则有间矣。永明而下，抑又甚焉。沈休文拘于声韵，王元长局于褊迫，江文通过于摹拟，

阴子坚涉于浅易，何仲言流于琐碎，至于徐孝穆、庾子山一以婉丽为宗，诗之变极矣。然而诸人虽或远式子建、越石，近宗灵运、元晖，方之元嘉，则又有不逮者焉。唐初承陈、隋之弊，多尊徐、庾，遂至颓靡不振。张子寿、苏廷硕、张道济相继而兴，各以风雅为师；而卢升之、王子安务欲凌跨三谢，刘希夷、王昌龄、沈云卿、宋少连亦欲蹴驾江、薛，固无不可者。奈何溺于久习，终不能改其旧，甚至以律法相高，益有四声八病之嫌矣。唯陈伯玉痛惩其弊，专师汉魏，而友景纯、渊明，可谓挺然不群之士，复古之功，于是为大。开元、天宝中，杜子美复继出，上薄风、雅，下该沈、宋，才夺苏、李，气吞曹、刘，掩颜、谢之孤高，杂徐、庾之流丽，真所谓集大成者，而诸作皆废矣。并时而作，有李太白，宗风骚及建安七子，其格极高，其变化若神龙之不可羁。有王摩诘依仿渊明，虽运词清雅，而萎弱少风骨。有韦应物祖袭灵运，能一寄秣鲜于简淡之中，渊明以来，盖一人而已。他如岑参、高达夫、刘长卿、孟浩然、元次山之属，咸以兴寄相高，取法建安。至于大历之际，钱、郎远师沈、宋，而苗、崔、卢、耿、吉、李诸家，亦皆本伯玉而宗黄初，诗道于是为最盛。韩、柳起于元和之间，韩初效建安，晚自成家，势若掀雷抉电，撑决于天地之垠。柳斟酌陶、谢之中，而措辞窈眇清妍，应物而下，亦一人而已。元、白近于轻俗，王、张过于浮丽，要皆同师于古乐府。贾浪仙独变入辟，以矫艳于元、白。刘梦得步骤少陵，而气韵不足。杜牧之沉涵灵运，而句意尚奇。孟东野阴祖沈、谢，而流于蹇涩。卢仝则又自出新意，而涉于怪诡。至于李长吉、温飞卿、李商隐、段成式专夸靡蔓，虽人人各有所师，而诗之变又极矣。比之大历，尚有所不逮，况厠之开元哉！过此以往，若朱庆余、项子迁、李文山、郑守愚、杜彦之、吴子华辈，则又驳乎不足议也。宋初，袭晚唐五季之弊。天圣以来，晏同叔、钱希圣、刘子仪、杨大年数人，亦思有以革之，第皆师于义山，全乖古雅之风。迨王元之以迈世之豪，俯就绳尺，以乐

天为法，欧阳永叔痛矫西昆，以退之为宗，苏子美、梅圣俞介乎其间。梅之覃思精微，学孟东野，苏之笔力横绝，宗杜子美，亦颇号为诗道中兴。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，盛公量之祖应物，石延年之效牧之，王介甫之原三谢，虽不绝似，皆尝得其仿佛者。元祐之间，苏、黄挺出，虽曰共师李、杜，而竞以己意相高，而诸作又废矣。自此以后，诗人迭起，或波澜富而句律疏，或锻炼精而情性远，大抵不出于二家。观于苏门四学士，及江西宗派诸诗，盖可见矣。陈去非虽晚出，乃能因崔德符而归宿于少陵，有不为流俗之所移易。驯至隆兴、乾道之时，尤延之之清婉，杨廷秀之深刻，范至能之宏丽，陆务观之敷腴，亦皆有可观者，然终不离天圣、元祐之故步，去盛唐为益远。下至萧、赵二氏，气局荒颓，而音节促迫，则其变又极矣。

由此观之，诗之格力崇卑，固若随世而变迁，然谓其皆不相师可乎？第所谓相师者，或有异焉。其上焉者，师其意，辞固不似，而气象无不同；其下焉者，师其辞，辞则似矣，求其精神之所寓，固未尝近也。然唯深于比兴者，乃能察知之耳。虽然，为诗当自名家，然后可传于不朽。若体规画圆，准方作矩，终为人之臣仆，尚乌得谓之诗哉！是何者？诗乃吟咏性情之具，而所谓风雅颂者，皆出于吾之一心，特因事感触而成，非智力之所能增损也。古之人其初虽有所沿袭，未复自成一家言，又岂规规然必于相师者哉！

呜呼！此未易为初学道也。近来学者，类多自高，操觚未能成章，辄阔视前古为无物。且扬言曰：曹、刘、李、杜、苏、黄诸作虽佳，不必师；吾即师，师吾心耳。故其所作，往往猖狂无伦，以扬沙走石为豪，而不复知有纯和冲粹之音，可胜叹哉！可胜叹哉！濂非能诗者，因足下之言，姑略诵所闻如此，唯足下裁择焉，不宣，濂白。

严荣校刻本《宋文宪公全集》卷三七

〔说明〕

宋濂(1310—1381)，字景濂，号潜溪，浦江(今属浙江)人。明

洪武二年诏修《元史》，命充总裁官。史成，除翰林院学士，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，以老致仕。后长孙慎坐法，举家谪茂州，道卒。追谥文宪。有《宋学士全集》三十六卷。《明史》卷一百二十八有传。

此文以诗歌发展史的眼光，对汉代以来的主要诗人作了提纲挈领式的评价，虽不专论唐诗，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宋濂的唐诗观。

关于唐诗的分期，宋濂分为唐初、盛唐、大历、元和、晚唐。对各期主要诗人的风格特色及其承传作了扼要的评述，体现出尊盛唐黜中唐以降的思想：如曰晚唐诗人虽各有所师，然“比之大历，尚有所不逮，况厠之开元哉”，“驳乎不足议也”；曰南宋四大诗人“终不离天圣元佑之故步，去盛唐为益远”。

宋濂认为，唐人好诗，皆宗师风雅：“相继而兴”的张子寿等人“各以风雅为师”；“挺然不群”的陈子昂“专师汉魏而友景纯、渊明”，而汉魏正是“驰骋于风雅者”；杜甫“上薄风雅”；李白“宗风骚及建安七子”；高、岑等“咸以兴寄相高，取法建安”。“元、白近于轻俗，王、张过于浮丽”，则是不宗风雅的结果。对风雅的推崇，正是宋濂明道致用文学思想的体现。因此，在所有诗人中，他最推崇的自然是杜甫。和许多道学家不同的是，宋濂有较深厚的文学素养，尊重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，这样，他对杜甫的理解就超越了一般的道学家，这在另一文《俞季渊〈杜诗举隅〉序》中表现明显：注杜者无虑数百家，“务穿凿者，谓一字皆有所出，泛引经史，巧为附会，榘酿而丛脞；骋新奇者，称其一饭不忘君，发为言辞，无非忠国爱君之意；至于率尔咏怀之作，亦必迁就而为之说……子美之诗，不白于世者，几五百年矣！”一语言中了自宋以来理学笼罩下的杜诗的遭遇。

关于师古与师心，一方面，宋濂提倡师古，批评师心者“猖狂无伦”、“以扬沙走石为豪”，要求古诗学汉魏晋，近体学盛唐尤其杜

甫；另一方面，又强调诗吟咏性情、感事而成的特质，指出若“体规画圆”，必不能自成一家。既要汲取古人的营养，又不至流于机械模拟，协调的办法是师其意不师其辞，“求其精神之所寓”。

作为开国诗论家，宋濂的理论对明代唐诗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。首先，提倡复古尊唐，从理论上为明代开了师古端绪。可以说，贯穿于有明一代的拟古思潮，特别是前后七子师法盛唐的主张，即发脉于此。其次，为师古派内部自我修正提供了理论依据。从前七子何景明的“领会神情”“不仿形迹”（《与李空同论诗书》），到后七子谢榛的“勿执于字句”而师古人“神气”（《诗家直说》），再到末五子屠隆的批评“字句虽因，神情不传”（《论诗文》）、胡应麟的主张融古人形迹而师其“兴象风神”（《诗薮》），都可以找到宋濂“求其精神之所寓”的理论精髓。最后，尊崇风教而能兼顾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，促使明人对杜甫的研究转向艺术本体。在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的宋代，杜甫被尊为“诗圣”，杜诗的主要价值被作为儒家经学的附庸。直至元代，人们重在从政教立场接受杜诗。后来，明人主要从审美的角度研究杜诗的艺术价值，宋濂功不可没。

附 录

乾坤清气集序

〔明〕贝 琼

诗盛于唐尚矣。盛唐之诗，称李太白、杜少陵而止。乾坤清气常靳于人，二子得所靳而形之诗，潇湘洞庭不足喻其广，龙门剑阁不足喻其峻，西施南威不足喻其态，千兵万马不足喻其气。若夜郎夔子诸篇，天发其藻，神泄其秘，二子亦岂知其诗之至于如此哉！予尝读二集而玩之，其凡则约乎情而反之正，表里国风，而薄乎雅

颂。代之作者，咸嗜其味矣，不过醢一于酢，醢一于咸，而忘其醇且和者。长庆以降，已不复论。宋诗推苏、黄，去李、杜为近，逮宋季而无诗矣。非无诗也，于二子之诗嗜而不知其味，故曰无诗。岂乾坤清气至是益靳而得之者益寡欤？有元混一天下，一时鸿生硕士，若刘、杨、虞、范出而鸣国家之盛，而五峰、铁崖二公继作，瑰诡奇绝，视有唐为无愧。或曰：“刘、杨而下善诗矣，岂皆李、杜乎？”则应之曰：“韶箎息而鼓吹作，衮冕弃而南冠出，固有非李、杜而李、杜者也。”前辈采而辑之，目曰皇元风雅，亦既行之于世，识者病其驳而未纯。钱唐金弘氏精选当代作者凡三十余人，题其集曰“乾坤清气”。一日抱其集见予黄湾之凰皇山下，求序以冠篇端，辍书其略如右。后生新进法诸古，参诸今，或有得焉，则丽而不浮也，奇而不僻也，易而不俚也，始可与言诗之味已。是说也，当与能诗者道之。

《四部丛刊》本《清江贝先生文集》卷一

练伯上诗序(节录)

[明]王 祹

古今诗道之变非一也。气运有升降，而文章与之为盛衰，盖其来久矣。《三百篇》勿论已，汉以来，苏子卿、李少卿实作者之首，此诗之始变也；迨乎建安，接魏黄初，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，刘公干、王仲宣相为倡和；正始之间，嵇、阮又继作，诗道于是为大盛，此其再变也。自是以后，正音稍微，逮晋太康而中兴，陆士衡兄弟、潘安仁、张茂先、张景阳、左太冲，皆其称首，而陶元亮天分独高，自其所得，殆超建安而上之。此又一变也。宋元嘉以还，三谢、颜、鲍者作，似复有汉魏风，然其间或伤藻刻，而浑厚之意缺焉，视太康不相及矣。齐永明而下，其弊兹甚：沈休文之拘于声韵，王元长之局于褊迫，江文通之过于摹拟，阴子坚、何仲言之流于纤琐，徐孝穆、庾子山之专于婉孌，无复古雅音矣。此又一变也。

唐初袭陈隋之弊，多宗徐庾，张子寿、苏廷硕、张道济、刘希夷、王昌龄、沈云卿、宋少连皆溺于久习，颓靡不振；王、杨、卢、骆始若开唐晋之端，而陈伯玉又力于复古，此又一变也。开元、大历，杜子美出，乃上薄风雅，下掩汉魏，所谓集大成者；而李太白又宗风骚而友建安，与杜相颉颃；复有王摩诘、韦应物、岑参、高达夫、刘长卿、孟浩然、元次山之属，咸以兴寄相高，以及钱、郎、苗、崔诸家，比比而作；既而韩退之、柳宗元起于元和，实方驾李杜，而元微之、白乐天、杜牧之，刘梦得，咸彬彬附和焉。唐世诗道之盛，于是为至。此又一变也。然自大历、元和以降，王建、张籍、贾浪仙、孟东野、李长吉、温飞卿、卢仝、刘义、李商隐、段成式，虽各自成家，而或沦于怪，或迫于险，或窘于寒苦，或流于靡曼，视开元远不逮；至其季年，朱庆余、项子迁、郑守愚、杜彦夫、吴子华辈，悉纤弱鄙陋而无足观矣。此又一变也。

宋初仍晚唐之习，天圣以来，晏同叔、钱希圣、杨大年、刘子仪，皆将易其习而莫之革；及欧阳永叔，乃痛矫西昆之弊，而苏子美、梅圣俞、王禹玉、石延年、王介甫竞以古学相尚；元祐间，苏、黄挺出，而诸作几废矣。此又一变也。建炎之余，日趋于弊。尤延之之清婉、朱元晦之冲雅、杨廷秀之深刻，范智能之宏丽，陆务观之敷腴，固粲然可观，抑去唐为已远。及乎淳佑、咸淳之末，莫不音促局而器苦窳，无以议为矣。此又一变也。元初承金氏之风，作者尚质朴而鲜辞致，至延祐、天历丰亨豫大之时，而范、虞、揭以及杨仲宏、元复初、柳道传、王继学、马伯庸、黄晋卿诸君子出，然后诗道之盛，几跨唐而轶汉。此又其一变也。然至于今未久也，而气运乖裂，士习遽卑，争务粉绘缕刻以相高，效齐梁而不能及。

伯上于斯时，独不移于流俗，益肆其学而昌于诗，蔼然和平之音，有融畅之工，无藻饰之态，凡出处离合欢欣忧戚跌宕抑郁之思，无不托于是焉。此所以自成其家而无愧也。余尝闻之杨公之言

曰：诗当取材于汉魏，而音节以唐为宗也。黄公之言曰：诗贵乎平实而流丽也。嗟乎，言诗之要，无易于此矣！

《金华丛书》本《王忠文公集》卷二

鸣盛集原序

[明] 刘 嵩

诗家者流，肇于康衢之《击壤》、虞廷之《赧歌》，继是者，泐泐乎《三百篇》之音，流而为《离骚》，派而为汉魏，正音洋洋乎盈耳矣。六代以还，尚绮藻之习，失淳和之气。唐兴，陈子昂氏作障厥狂澜，杜审言、宋之问、沈佺期、李峤又从而叹之。至开元、天宝间，有若李白、杜甫、常建、储光羲、孟浩然、王维、李颀、岑参、高适、薛据、崔颢诸君子各鸣其所长，于是气韵声律灿然大备。及列而为大历，降而为晚唐，愈变而愈下，迨夫宋则不足征矣。元有范、虞、杨、揭、赵数家，颇踵唐人之辙，至于兴象则不逮焉。

噫！文与时迁，气随运复，不有作者，孰能与之？今观林员外子羽诗，始窥陈拾遗之阃奥，而骏骥乎开元之盛风，若殷璠所论神来、气来、情来者，莫不兼备。虽其天资卓绝，心会神融，然亦国家气运之盛驯致然也。谨题其集曰《鸣盛》，为之序云。洪武庚申季春既望，嘉议大夫礼部侍郎权吏部尚书庐陵刘嵩子高序。

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鸣盛集》卷首

独庵集序(节录)

[明] 高 启

诗之要，有曰格、曰意、曰趣而已。格以辩其体，意以达其情，趣以臻其妙也。体不辩则入于邪陋，而师古之义乖；情不达则堕于浮虚，而感人之实浅；妙不臻则流于凡近，而超俗之风微。三者既

得，而后典雅、冲淡、豪俊、秣缛、幽婉、奇险之辞变化不一，随所宜而赋焉。如万物之生，洪纤各具乎天，四序之行，荣惨各适其职。又能声不违节，言必止义，如是而诗之道备矣。

夫自汉魏晋唐而降，杜甫氏之外，诸作者各以所长名家，而不能相兼也。学者誉此诋彼，各师所嗜，譬犹行者埋轮一乡，而欲观九州之大，必无至矣。盖尝论之，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，长吉之工奇而不足以咏丘园之致，皆未得为全也。故必兼师众长，随事摹拟，待其时至心融，浑然自成，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。余少喜攻诗，患于多门，莫知所入，久而窃有见于是焉。

《四部丛刊》本《高太史鳧藻集》卷二

霏雪录(节录)

[明] 刘 绩

唐人诗一家自有一家声调，高下疾徐，皆合律吕，吟而绎之，令人有闻《韶》忘味之意。宋人诗，譬则村鼓岛笛，杂乱无伦。

或问予唐宋人诗之别，余答之曰：唐人诗纯，宋人诗驳；唐人诗活，宋人诗滞；唐诗自在，宋诗费力；唐诗浑成，宋诗短钉；唐诗缜密，宋诗漏逗；唐诗温润，宋诗枯燥；唐诗铿锵，宋诗散缓；唐人诗如贵介公子，举止风流；宋人诗如三家村乍富人，盛服揖宾，辞容鄙俗。

唐人咏物诗，于景意事情外别有一种思致，不可言传，必心领神会始得。此后人所以不及唐也。如陆鲁望《白莲》诗云：“素蘼多蒙别艳欺，此花真合在瑶池，还应有恨无人觉，月晓风清欲堕时。”妙处不在言句上，宋人都晓不得。如东坡咏荔枝，梅圣俞咏河豚，此等类非诗，特俗所谓偈子耳。

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霏雪录》卷下

古诗选唐序(节录)

[明] 苏伯衡

夫惟诗之音系乎世变也,是以大小雅、十三国风出于文武成康之时者,则谓之正雅、正风;出于夷王以下者,则谓之变雅、变风。风雅变而为骚些,骚些变而为乐府、为选、为律,愈变而愈下。

不论其世,而论其体裁可乎?李唐有天下三百余年,其世盖屡变矣。有盛唐焉,有中唐焉,有晚唐焉。晚唐之诗,其体裁非不犹中唐之诗也;中唐之诗,其体裁非不犹盛唐之诗也。然盛唐之诗,其音岂中唐之诗可同日语哉!中唐之诗,其音岂晚唐之诗可同日语哉!昔襄城杨伯谦选唐诗为《唐音》录,蜀郡虞文靖公序之,慨夫声文之成系于世道之升降,而终之以一言曰:吾于伯谦之录,安得不叹?夫知言之难也,盖不能无憾焉。无他,文之日降,譬如水之日下,有莫之能御者。故唐不汉,汉不秦,秦不战国,战国不春秋,春秋不三代,三代不唐虞。自李唐一代之诗观之,晚不及中,中不及盛。伯谦以盛唐、中唐、晚唐别之,其岂不以此乎?然而盛时之诗,不谓之正音而谓之始音;衰世之诗,不谓之变音而谓之正音;又以盛唐、中唐、晚唐并谓之遗响。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也,其亦异乎大小雅、十三国风之所以为正为变者矣。诗与乐固一道也,不审音不足以知乐,不审音则何以知诗?伯谦之于音如此,则其于诗也可见矣。此文靖之所以不能无憾也欤!

平阳林敬伯,早岁诵文靖之序,深有概乎其衷。及游国学,质诸博士贝廷琚、刘子宪,而知《唐音》去取出其嗜好也。其友蒙阴县簿,暇日乃更选焉。非有风雅骚些之遗韵者,不取也。得七百六首,随其世次,厘为六卷。以所选皆五七言古诗,故目为“古诗选唐”。敬伯之言曰:“窃闻诗缘情而作者也。……奈何律诗出而声律、对偶、章句,拘拘之甚也?诗之所以为诗者,至是尽废矣。故后

世之诗不失古意，惟有古诗。而今于唐诗亦惟选古，律以下则置之。而况唐之诗近古而尤浑噩，莫若李太白、杜子美。至于韩退之，虽材高欲自成家，然其吐辞暗与古合者，可胜道哉！而《唐音》乃皆不之录。今则不敢不录焉。”余伟其论之确、论之曼、而选之精也，是以备著之。於戏！此诗选胜于《唐音》远甚，使文靖复生而见之，宁不快于其意，必有以发挥敬伯之用心者矣。

《四部丛刊》本《苏平仲文集》卷四

唐诗品汇总叙

[明] 高 棅

有唐三百年诗，众体备矣。故有往体、近体、长短篇、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，莫不兴于始，成于中，流于变，而*之于终。至于声律兴象，文词理致，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。略而言之，则有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之不同。详而分之，贞观、永徽之时，虞、魏诸公，稍离旧习，王、杨、卢、骆，因加美丽，刘希夷有闺帷之作，上官仪有婉媚之体，此初唐之始制也；神龙以还，洎开元初，陈子昂古风雅正，李巨山文章宿老，沈、宋之新声，苏、张之大手笔，此初唐之渐盛也；开元、天宝间，则有李翰林之飘逸，杜工部之沉郁，孟襄阳之清雅，王右丞之精致，储光羲之真率，王昌龄之声俊，高适、岑参之悲壮，李颀、常建之超凡，此盛唐之盛者也；大历、贞元中，则有韦苏州之雅淡，刘随州之闲旷，钱、郎之清赡，皇甫之冲秀，秦公绪之山林，李从一之台阁，此中唐之再盛也；下暨元和之际，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，韩昌黎之博大其词，张、王乐府，得其故实，元、白序事，务在分明，与夫李贺、卢仝之鬼怪，孟郊、贾岛之饥寒，此晚唐之变也；降而开成以后，则有杜牧之之豪纵，温飞卿之绮靡，李义山之隐僻，许用晦之偶对，他若刘沧、马戴、李频、李群玉辈，尚能黽勉气格，将迈时流，此晚唐变态之极，而遗风余韵，犹有存者焉。

是皆名家擅场,驰骋当世。或称才子,或推诗豪,或谓五言长城,或为律诗龟鉴,或号诗人冠冕,或尊海内文宗,靡不有精粗邪正长短高下之不同。观者苟非穷精阐微,超神入化,玲珑透彻之悟,则莫能得其门,而臻其壶奥矣。今试以数十百篇之诗,隐其姓名,以示学者,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,何者为盛唐,何者为中唐、为晚唐,又何者为王、杨、卢、骆,又何者为沈、宋,又何者为陈拾遗,又为何为李、杜,又为何为孟为储,为二王,为高、岑,为常、刘、韦、柳,为韩、李、张、王、元、白、郊、岛之制。辩尽诸家,剖析毫芒,方是作者。

予夙耽于诗,恒欲窥唐人之藩篱。首踵其域,如堕终南万叠间,茫然弗知其所往。然后左攀右涉,晨跻夕览,下上陟顿,进退周旋,历十数年。厥中僻蹊通庄,高门邃室,历历可指数。故不自揆,窃愿偶心前哲,采摭群英,芟夷繁翳,裒成一集,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。载观诸家选本,详略不侔。《英华》以类见拘,《乐府》为题所界,是皆略于盛唐,而详于晚唐。他如《朝英》、《国秀》、《篋中》、《丹阳》、《英灵》、《间气》、《极玄》、《又玄》、《诗府》、《诗统》、《三体》、《众妙》等集,立意造论,各该一端。惟近代襄城杨伯谦氏《唐音》集,颇能别体制之始终,审音律之正变,可谓得唐人之三尺矣,然而李、杜大家不录,岑、刘古调微存,张籍、王建、许浑、李商隐律诗载诸正音,渤海高适、江宁王昌龄五言稍见遗响。每一披读,未尝不叹息于斯。

由是远览穷搜,审详取舍,以一二大家,十数名家,与夫善鸣者,殆将数百,校其体裁,分体从类,随类定其品目,因目别其上下、始终、正变,各立序论,以弁其端。爰自贞观至天祐,通得六百二十人,共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,分为九十卷,总题曰《唐诗品汇》。呜呼!唐诗之偈,弗传久矣。唐诗之道,或时以明。诚使吟咏性情之士,观诗以求其人,因人以知其时,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、词气之盛衰,本乎始以达其终,审其变而归于正,则优游敦厚之教,未必无

小补云。

洪武癸酉春,新宁高棅谨序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汪宗尼校订本《唐诗品汇》卷首

[说明]

高棅(1350—1423),字彦恢,更名廷礼,号漫士,长乐(今属福建)人。永乐初以布衣召入翰林为待诏,迁典籍。为闽中十才子之一,其诗学思想直接源于闽中前辈严羽。有《啸台集》二十卷、《木天清气集》十四卷。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六《文苑》有传。

《唐诗品汇》为明代唐诗学的第一个范本。书成于洪武二十六年,初编九十卷,录唐六百二十家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,后又于洪武三十一年搜补六十一家诗九百五十四首为《唐诗补遗》附于书后。该书分体编排,计五古二十四卷,七古(附歌行长篇)十三卷,五绝(附六言绝句)八卷、七绝十卷、五律十五卷、五排十一卷、七律(附七排)九卷。每体中再分列正始、正宗、大家、名家、羽翼、接武、正变、余响、旁流九个品目(故名《品汇》);每体前皆有“叙目”,说明该体的渊源及其在唐代的流变,与书前《总叙》一起构成了系统的诗学理论。本文为全书的论纲,其理论要点有二。

一、汇编宗旨:“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”:“观诗以求其人,因人以知其时,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,词气之盛衰,本乎始以达其终,审其变而归于正”。由诗而人,由人而时,由时而辨作品之高下盛衰,审察其流变而取其正路。

二、从上述宗旨出发,重在辨别体制。包括描述各种体裁的兴衰流变和区别由“声律兴象文词理致”所决定的诗歌风格的优劣。从时代总体风貌而言,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各不相同,即便同一时代,各阶段亦有别:初唐有“始制”和“渐盛”,晚唐有“变”和“变态之极”,其间贯穿着以“盛衰正变”论诗的指导思想;从个人风格及成就来说,虽皆“名家擅场,驰骋当世”,“靡不有精粗、邪正、长